◈纵　横

##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乡权活动

认清乡权的特点。首先，乡权全部是执行性的。其次，乡权不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权，乡权行使的全部目的就是保护、维护、保障农民各项权利权益。

将乡镇政府的职能重心转到乡村社会发展。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础，乡镇政府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中责任重大，必须将政府职能重心转到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社会问题治理上。

治理乡村社会问题要先易后难，渐次推进。乡村社会问题多，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在哪个问题上切入，在哪个问题上扩展，包括乡镇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要统筹安排，渐次推进。

推动乡村社会发展要科学设计，因地制宜。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要讲科学、用智慧、巧设计、顺乎自然、因地制宜，不搞大轰大嗡、大拆大建、劳民伤财。

正确处理乡政与村治的关系。在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存在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即乡政与村治。乡政是指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政府行政活动，村治是指以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活动。乡村社会的治理需要乡政与村治的共同作用，有机衔接。（2015年6月上《人民论坛》郎佩娟）

◈文　坛

## 改变我们文化的实用性品格

智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智育的目标是实现头脑的价值。现在对智育流行一种狭隘的理解，就是把它仅仅理解为知识的灌输，甚至归结为考试的分数、职业的技能。在人的智力品质中，第一重要的品质是好奇心。好奇心是非常可贵的，但也很容易被扼杀和磨灭掉。在我看来，好奇心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习惯，往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一些事物见多了，习以为常了，就自以为懂了。好奇心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就是功利心。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实用性，无论对什么事物，首先就问有没有用。

很多人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世界级的大师。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太实用，什么东西都要问有没有用，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大弱点。如果一个民族尊重精神本身的价值，纯粹出于兴趣从事精神事业的人越多，那个民族就会成为肥沃的土壤，最容易出大师。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我们文化的实用性品格，形成一种全民族尊重精神价值的氛围。（2015年8月17日《北京日报》周国平）

## 尊师与治国

《论语》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理，如果君主希望百姓尊师重道，就必须自己率先垂范。古代圣王都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因此，“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

汉明帝就是一位尊师的典范。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明帝为太子时，曾向桓荣学习《尚书》，在他做皇帝后，仍以学生身份自居。汉明帝造访太常府时，以师生之礼与桓荣相见，并设几杖，召集百官和桓荣的弟子数百人一起向桓荣行弟子礼，并由他亲自执礼，带头听受老师讲学。

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战乱后短期内就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天下太平、万国来朝，与他尊师重道并赐予皇子、诸王们学习《群书治要》密不可分；清朝“康乾盛世”的缔造，更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设立了礼请儒释道大德为“国师”、坚持讲经教学的制度相关。反之，唐朝之所以衰于唐玄宗、清朝之所以亡于慈禧太后，都是因为圣教的废弛、对师道的轻忽。

天子之所以应尊师重道，因为天子的职责是践行圣道，而老师的职责是传承圣道。天子唯有从师而学，才能修德明道进而平治天下。纵观中国千年历史的兴衰，可以发现：凡是尊师重道的时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期；凡是轻师贱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衰败和灭亡的转折点。正如《荀子·大略》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在古代“天下之命，悬于太子”，能否尽早为太子选择明师教导，决定着国家的安危。这说明，国家是否有真正的后继人才，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好老师的教导。所谓“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淮南子》中记载：“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唯有身体力行圣贤教诲的君子圣贤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主体，才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重要贡献。（2015年9月7日理论网 刘余莉）

◈观　点

## 转型期中的地方政府债务政策

就目前来看，对于经济增长过快减速的担忧已经成了中央关注的焦点。所以，政府会提高对于风险的容忍度，放宽地方政府债务的口子，提高其融资便利。但目前经济中已经开始滋生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未来可能带来较大的挑战。因此，应该本着“法治为基础，适度灵活性”的原则，制定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政策。

以法治为基础，对地方政府债务依法约束。美国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其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尽管如此，美国的政府债务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不得随意扩张。美国的州一级政府可以发行债券，但伴随着严格的监管。监管主要内容包括事前监管和破产机制。事前监管指通过立法对地方政府的借贷活动做出规定，具体规定有：借贷只能用于长期公共资产投资，一般不能用于政府的日常支出；对借贷的关键变量事先做出限制，包括财政赤字、偿债比率、担保上限等；要求预算过程公开透明，对财政账目进行公开的审计，定期发布财政债务信息。此外，建立了完善的破产机制。地方政府如果出现债务违约，将进入到破产程序。破产机制的设计考虑公共机构破产与私人机构破产的不同，既要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又要注意维持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目前美国的破产法仅允许市和市以下地方政府宣布破产，不适用于州政府。在完善的法律约束之下，美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权责利较好地匹配，风险合理分散，减少道德风险。

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应在完善法治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约束。首先，从法律层面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鉴于地方政府负债巨大已是既成事实，承认此事实并不会减轻地方政府的责任，反而有利于让地方政府承担其债务责任。其次，严格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对于债券融资所投资的项目，从事前、事中、事后多个环节进行监管，使之高度透明化。发挥地方人大对于政府发债的约束力，培育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项目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为投资者提供客观中立的各类信息。

充分认识到转型的意义和难度，减少政策灵活性。其实这涉及怎么看到转型期的问题。任何一个经济体，从开始经济起飞到最终成长为发达经济体，都需要经过一次次转型。这一过程无论长短，都会是比较痛苦的。它意味着新的产业逐步取代旧的产业；旧的产业逐步退出市场。劳动者们因不再适应新的市场需求要么退出劳动力市场，要么需要进行新的职业培训。很少有国家是在极短的时间内高速、顺利度过转型期的，我们应该给予经济增速放缓以更耐心的心理准备。

同样以美国为例。随着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开始出现实体经济增长潜力不足。紧接着因过度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业，金融过度创新而产生金融危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打击很大，但同时也是市场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时候。一些低效的企业退出市场，一些过剩的产能被淘汰，资源重新处于高度流动的状态，并积极向最富有活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域聚集。这一期间，美国除了用积极的货币政策放松银根外，较少使用其他刺激性的政策，对于债务政策更是采取了依法实施的做法。

就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而言，当前应坚持适度灵活的原则，不必急于全面放松。应提高对GDP增速下降的容忍度。避免一些落后产业借着宽松的政策死灰复燃，甚至继续扩大，带来更大的麻烦。也避免人为地增加经济的波动，到后来失去了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2015年第8期《行政管理改革》徐杰）

## 打破社会动员的“体制内外”壁垒

国家治理离不开社会动员，国家治理内涵也必须包含对社会动员的治理。一段时间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中间状态，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格局，即俗称“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行动空间及其内在逻辑的隔离和对峙。这种状态在社会动员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本身表明，一方面自由自愿基础上的商品交易已经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政府仍然掌握着强大的市场干预权力。前者意味着普通人只要能提供为市场所接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自食其力”，不用依附于任何机构，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与个人那种近似于不可选择但又摆脱不掉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不复存在。后者则意味着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依附性交往关系和行政命令下的行为方式仍然在部分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所谓体制内指的就是后者，而体制外就是前者。

由此可见，身份社会无所不在。在社会动员上，自然出现了同样的“体制内外”之别。各种通过组织纽带和指令性要求而集合起来共同行动的人员都可以归入“体制内动员”范畴，而完全凭个人兴趣或认同自愿参与、自主脱离、相互间没有固定和稳定关系的行动者，都可以归入“体制外动员”。

以现实利益为观察点，体制内动员所遵循的原理是维护现行秩序和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而体制外群体因为主要由中低层人士组成，所以更希望在现行秩序中维护自身利益和争取更多利益，体制内外动员的动力走向亦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体制拥有雄厚的资源，尤其是强制性资源，所以有时甚至可以忽略被动员者的意愿，只要配置好落实命令所必需的相应资源即可。也因此，体制内动员时常被批评为“粗鲁”“横蛮”。人类行动的风格最后取决于个人或群体拥有的解决问题的资源。而体制外动员缺乏资源，唯有使巧劲，才能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所以，体制外动员基本上都经过策划，其中有许多富有创意，因此“智力型动员”可以用作体制外动员的别称。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问题不在于公共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动员方式，而在于两种方式之间存在某种隔离和对峙。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当下两种社会动员方式存在的分立和对峙，既需要心平气和对待之，也需要立足长远设法缓和乃至疏通之。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凡是市场或社会能办的，就交给市场或社会”，政府可以不出席的场合就不要出席，把空间尽可能完整地交还给民众。

政府适度让出公共空间，有助于政府更好地转变职能，从主要关注效率转向首先关注公平，真正扮演好“公共角色”，在不同群体之间一碗水端平。政府的职能定位准了，占领了“公平”这个道义制高点，体制内外的对话有了彼此认可的基础，两种社会动员的冲撞可能就大大减少。2008年汶川地震中抗震救灾的最大成效便是国家与民间在社会动员上的高度一致所致，恰恰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募捐金额史无前例地超过了1000亿元。

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城乡二元及国有民营两种体制身份等形形色色的结构性分立无法短期内消除，体制内外两种社会动员方式的分立乃至对峙也将会长期存在。如何创设一个跨体制内外的制度性框架，将两者收纳于其中，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而综合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看来，这个制度性框架应该就是法治：只要两种社会动员方式都依法开展，二者协同就自然有了共同基础。那么有效规范行政权力，实质性扩大公民权利，也就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制度设计，亦预示着国家和国民共同的努力方向。（2015年第31期《国家治理》顾骏）

◈史海钩沉

## 从《朱文公政训》看为官之要

《朱文公政训》是南宋朱熹与门人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之一，《政训》中的言论是朱熹以自己的从政经历对当时治国安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看法，不仅对封建社的官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在加强廉政建设、端正社会风气的今天，对各级领导干部也具有教育警示意义。

**为官要正其根本，本正则万目俱举。**《政训》中讲道：“大贤君子正其根本，使万目俱举，吾民得乐其生。”“理却是心之骨，这骨子不端正，少间万事一齐都差了。”“三纲五常”“正心诚意”“忠孝仁义”等是传统儒家文化对官员修身的根本要求。在这些道德观念的感召下，官员能够树立起比较牢固的道德底线。朱熹修编的《大学》设定了官员具体的修身公式，即伦理学上讲的自律，有了自律，才能有诚意、正心、齐家、治国、明德于天下的业绩。当然这是封建社会对官员的要求，今天我们主要讲坚定理想信念，二者是相通的、一致的。

**为官要一心为公，为公则不徇私情。**《政训》中讲道：“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稍。”公是相对于私而言的。为官要公是官员的职责本身所决定的，官员不论品级高低，处理政事都要出以公心，时时处处从公众的角度而不是个体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最高目标。但是，官员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人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先其事而后其食”便是指公心。官员要能够做到重公利舍私利，严于律己，公而忘私，过得了私情关。所以，官员对“公”的恪守，应当成为其基本的思想要求和行为准则，贯彻在日常的具体工作和生活中。

**为官要平易近民，近民则本固邦宁。**《政训》中讲道：“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平易近民，为政之本。”在日常为政实践中，官员为公的实际表现为为民，为公和为民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公比较抽象，民则是具体的、实在的。民以及官民关系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就是为政者和思想家们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因此，为官者必须将这种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为民办实事、除弊政，“事无大小，为之必成；害无大小，除之必去”。

**为官要敢于担当，担当则政事可成。**《政训》中讲道：“若既要为大官，又要避祸，无此理。”“天下之事，所以可权衡者，正谓轻重不同……利七而害三，则当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然必欲求全，恐并与所谓利者失之矣。”当一个朝代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官场生态就会发生变化，官员“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时进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会事”。有些官员虽然曾经有能力干事，但一经挫抑，就“一切刓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不担当就会导致“民有冤抑，无处申诉”，社会矛盾越积越尖锐。敢于担当自古以来就是官员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操守，更是一名当代领导干部的时代责任和必备的基本素质。

**为官要宽严相济，相济则民众畏服。**《政训》中讲道，为政者“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须是令行禁止”。大至一国、小至一域，不论重要职位、平凡岗位，各类官员都会遇到宽与严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讲，儒家文化强调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对民众施以仁政，通过教化的手段，使民众自觉服从统治。所以，宽严相济原则对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来说也很适用。

**为官要缓急有序，有序则处事不紊。**《政训》中讲道，“天下事无不当理会，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序，须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余”。这实际上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中央官员，面临的事务都是千丝万缕的，这就需要官员能够从这千丝万缕、纷纭复杂的事务中，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理出头绪，找出急务，重点用力，然后推及其余，带动整体。

**为官要深入体察，体察则思虑周全。**《政训》中讲道，“凡事须仔细体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处，防备到人所防备不到处，方得无事”。官员面临的社会形势是复杂多变的，面对的民风民情也是多种多样的，必须深入民众之中细致地体验察看民间生产生活情况，从中找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为政思路，制定出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体察在今天来说就是调查研究，是官员必备的一种工作方法。

**为官要恭谨戒惧，谨戒则心无旁骛。**《政训》中讲道，“凡事须是小心寅畏”，“为政，如无大利害，不必议更张，则所更一事未成，必哄然成纷扰，卒未已也”。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与百姓存在着利害关系，所以诸事切宜畏谨，也就是要处处谨慎从事。畏谨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要在实施的过程中对为政中的政策措施不断加以完善，如果没有大的利害冲突，不能轻易推翻重来，尤其是对以前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定法，如果改革不慎，反而可能给百姓带来损害。

**为官要廉勤自守，自守则不起妄念。**《政训》中讲道：“士人先要识个礼义廉退之节，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勤政廉政是为官的本分，做官就是要廉洁、勤勉，坚守自己的节操。职位的高低、升迁的快慢、事业的起伏，都要顺应时势，切不可抱有非分之想，搞歪门邪道。为官者不仅要勤于具体事务，更要经常检束身心，不断地锤炼和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来更好地应对和处理人情世故以及日常政务。廉勤自守对今天为官之意义则更大。清正廉洁是官德的核心，为官清廉，才能不受蒙蔽，明察是非，才能一身清白，没有私心，敢于公正处事。

**为官要心存钦恤，存恤则慎重不滥。**《政训》中讲道，官员理狱量刑要“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罪之疑者从轻，功之疑者从重”。古代官员身兼行政、司法等权，不少官员被罪福报应之说所迷惑，多喜欢出入罪以求福报，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甚至曲解《尚书》关于钦恤之说，卖弄条贯、舞法受赃，“凡罪之当杀者，必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则率多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以至于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长奸惠恶”。因此，理狱量刑要心存钦恤，详审曲直，罪刑相适，慎重不滥。这就告诫身负治理地方社会之重任的官员们，执法必须严谨。（2015年7月上《领导科学》王国宇）

◈评　论

## 准确判断中国经济不能忽视农业指标

近段时间，由于上半年的一些经济数据下行，以及近期股市波动等因素，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不乐观甚至悲观的声音。这些声音，除了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基本面缺乏全面深入了解，还有一个明显缺陷，就是降低或者忽视了农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作为全球农业经济中的“大块头”，中国农业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忽视了农业指标来判断中国经济形势，只会是片面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

中国农业形势怎么样？答案有一个醒目的词：亮点。从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到经济学者，一个共同的看法是，农业形势是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亮点。体现这一亮点的数据很多，除了我们熟知的粮食持续增产，确保了中国人饭碗主要装中国粮，还有其他主要农产品产量以及投资和消费等诸多数据。比如，在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方面，几乎全线超过或接近国际水平。我国的蔬菜人均占有量540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水果人均消费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多公斤；禽蛋人均消费量是美国和欧盟的近两倍；而肉类、禽蛋、水产品的整个人均占有量已基本接近美国。

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产能的提高，意味着农业投入的增加、科技支撑力的提高和农机等重大生产资料的增长，这又直接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从而使整个农村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进入到新的阶段。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耕地整治、农民有序转移和小城镇建设、重大水利工程和农村水电路网建设、重大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障等重要工作不断加快推进，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不仅带来农村环境的巨大改变，也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就业和消费商机。这些年许多企业转型投入农业，众多创业者进入农业“蓝海”，就是基于农业前景广阔这一基本研判。

更要看到，在中国经济深度转型发展的进程中，农业转型发展依然跑在前面。以农村土地经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催生了新型经营主体、农业绿色增长、农业互联网、农村金融改革等方面的提质增效。农村改革创新的加快，既拓宽了农业投入领域，使过去较为单一的土地投入产出逐渐转变为全链条、宽领域的投入产出格局，同时因为绿色发展的增重又促进了科技投入、信息化投入、种子投入、环境投入比重的增加，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大，从而对经济发展形成更加宽泛、更加强劲的拉力和助力。

当然，农业在GDP中的占比不高，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过，作为全世界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农业占比不高，恰恰说明中国经济一、二、三产业结构更加协调，而农业经济的全线飘红本身就是经济稳定增长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见证。农业的大好局面不仅对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稳步进入新常态会起到保障供给、提振信心的强基固本作用，也会对世界经济稳定发挥不可或缺的影响力。如果中国农业欠佳，全球农业都将出现恐慌。因此，准确评判中国经济形势，必须全面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农业的大好形势，从而把握大局，乘势而上。（2015年9月6日《经济日报》瞿长福）